

劳动力不足与老龄化冲击全球制造业,影响经济增长,为此产业变革势在必行

当劳动者越来越老

梁凡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产业结构也由此发生深刻转变。

为此,一些国家推出多项政策措施,以期缓解老龄化加速带来的负面冲击。

韩国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韩国制造业从业者中,年满50岁的工人占比在十年内几乎翻一番。劳动力老龄化预计将严重冲击制造业这一韩国“经济发动机”。

报告称,2010年至2020年间,制造业年满50岁的工人占比从15.7%增至30.1%;2020年韩国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年龄为42.5岁,比2011年增长3.3岁;如果老龄化趋势持续,到2026年前后,韩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年龄将达到44.9岁。按照韩国经济研究所的说法,韩国制造业劳动力老龄化已“达到严重程度”。

与制造业从业者老龄化现象相伴的,是韩国整个社会人口结构的老龄化。

2017年,韩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4%,韩国由此迈入老龄化社会。有报道称,韩国有可能在2025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届时有

可能增至20%。

除了从业者年龄上升之外,社会老龄化往往还意味着劳动力的短缺,而后者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是更为致命的,尤其会对制造业这种对从业者规模和体能有所要求的行业造成重大影响。

德国联邦劳动局局长德特勒夫·舍勒8月24日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等趋势的发展,德国适龄劳动人口今年一年内将减少近15万人,未来数年间这一趋势还将愈演愈烈。

他警告称,德国恐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从护理人员到空调维修工,再到物流人员,乃至学术人员——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在各个行业普遍存在”。

二

在一些国家或地区,人口结构老龄化所造成的直接经济后果,已经逐步显现。

“韩国制造业开始步入衰老。”韩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研究显示,韩国制造业总生产率的增长率,从1995年至2000年间的7.3%降至2010年至2013年间的3.1%,对经济的贡献率也不断下滑。

韩国经济研究所在日前发布的报告中表示,鉴于韩国制造业50岁以上工人薪资待遇增速远高于30多岁的工人,劳动力老龄化将

加重企业经济负担。而高龄层的工资之所以比青壮年层上涨得快,与生产效率无关,而是因为工资是随着工龄和年龄上涨的。

韩国经济研究院专家表示,制造业老龄化将导致国家竞争力下降,加剧收入两极化和青年贫困。

国际投资银行高盛针对1996年至2014年间全球40个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会导致服务消费增加而商品消费减少。商品消费的放缓,将导致目前已经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这意味着制造业将面临严峻挑战。

高盛认为,对于亚洲新兴经济体而言,在未来20年内,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商品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减少8个百分点。

目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已得到了广泛证实,其中已经得到阐明的机制是,老龄化将造成劳动力减少,并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旦不能顺利实现经济与产业结构的转型,经济增长将面临较大冲击。

三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9年发布的人口展望报告预计,到2050年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持续下降的国家或地区数量将增至55个;同期,世界人口老龄化加剧,65岁及以

上人口占比将从目前的约9%增长到16%,成为增长最快的年龄组,届时欧洲和北美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世界人口增长放缓、多国人口先后达峰的背景下,劳动力不足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应对人力资源不足,产业变革势在必行。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劳动力规模下降带来的潜在问题,实现制造业等领域的自动化是一大趋势。美国经济学会此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有望抵消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波士顿大学进行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1993年至2014年间,对机器人投资最高的国家是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数据显示,老龄化速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每1000名工人对应的机器人数量就增加0.9个。

此外,随着老龄劳动人口大幅增长,部分劳动场所也在进行适老化改造。有报道称,早在2007年,宝马汽车公司为适应其预计在2017年会出现的员工总体年龄提高的问题,重新设计了变速箱生产线,引入可以缓和关节劳损的木质地板、特殊鞋鞋以及用来处理小部件的可调节放大镜。这些细微调整能够帮助公司用最小的成本,将年长工人的生产力提升至年轻工人的水平。



重启室内口罩令

8月25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商场门外张贴着佩戴口罩进入的告示。当日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重启室内口罩令。民众无论是否接种过新冠疫苗,进入公共室内场所须戴口罩。新华社发(梁森摄)

一周数读

12.8亿人

8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和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联合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019年全球30岁至79岁的高血压患者约为12.8亿人,而1990年这一数字为6.5亿人。

报告认为,高血压患者人数增加与全球人口增长和老龄化有关,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患者比例上升。2019年,82%的全球高血压患者生活在在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

8000万人

亚洲开发银行8月24日发布报告表示,受疫情影响,去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可能有多达80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极端贫困指的是一个人每天的生活开支在1.90美元以下。

这份报告称,如果没有疫情,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极端贫困率将从2017年的5.2%下降到2020年的2.6%。但疫情导致工作中断和经济活动停滞,一些国家的经济出现严重萎缩。

7.91亿欧元

希腊央行8月23日公布的报告显示,今年6月希腊旅游业收入7.91亿欧元,相比去年同期的8300万欧元增加了8倍多。1月至6月旅游收入为11.08亿欧元。

旅游业是希腊重要支柱,为国民经济贡献五分之一收入。今年5月希腊重新开放旅游市场,旅游业随后出现较快复苏。但是,希腊和欧洲的疫情形势仍可能对希腊旅游业产生影响。(郭济译)

德国奏响“总理猜想曲”

毕振山

大约一年前,被社民党提名为该党总理候选人的奥拉夫·肖尔茨,大概不会想到自己现在是德国民意支持率最高的总理候选人。

德国民调机构Forsa8月24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德国社民党的支持率升至23%,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为22%。这是社民党支持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联盟党。

而在几天前,德国电视一台发布的民调显示,联盟党以23%的支持率领先社民党的21%。不过,在各党总理候选人支持率方面,肖尔茨的支持率达到了41%,远远领先于联盟党候选人拉舍特的16%和绿党候选人贝尔伯克的12%。

如果按照这一趋势,那么现任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肖尔茨成为德国总理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2020年8月,民意支持率低至历史谷底的社民党推举肖尔茨为总理候选人。肖尔茨因此成为主要政党推举的第一个候选人。舆论当时认为社民党想要利用肖尔茨的高人气为本党助选,但普遍预计肖尔茨可能会成为大选“看客”。

现年63岁的肖尔茨从政经验丰富,曾长期担任汉堡市第一市长。2018年联盟党和社民党组建大联合政府后,肖尔茨出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新冠疫情暴发后,肖尔茨力推德国联邦政府出台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财政计划,因此博得民众好感。

今年4月,绿党推举该党双主席之一的贝尔伯克为总理候选人。借助于德国民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以及贝尔伯克的年轻形象,绿党支持率此后一路上升,最高时甚至超过了联盟党。贝尔伯克可能成为德国第二位女总理的猜测随之出现。

联盟党也在4月推出了该党总理候选人拉舍特。虽然当时拉舍特在民众中的知名度并不高,但他得到总理默克尔力挺和联盟党高支持率的加持,同样被认为是下一任总理的热门人选。

然而,无论是贝尔伯克还是拉舍特,后来都“翻车”了。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贝尔伯克卷入了多起风波,包括发表个人简历、所著新书涉嫌抄袭、隐瞒副业收入等。她因此被民众批评“不诚实”,个人支持率和绿党支持率也随之下跌。

而拉舍特的问题则与他的一次“大笑”有关。今年7月德国西部发生洪灾时,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前往灾区视察,随行的拉舍特却被拍到与多名官员大笑,这引发公众对拉舍特的广泛批评。拉舍特2009年出版的一本书同样被指涉嫌抄袭,也拉低了他的支持率。

就这样,在拉舍特和贝尔伯克支持率双双下跌的同时,多次前往洪灾地区视察且推出救助方案的肖尔茨成了民众青睐的候选人,其个人和社民党的支持率也迅速逆袭。

从目前的民调来看,德国大选可能会出现社民党与联盟党两强相争的局面,肖尔茨和拉舍特都有出任总理的可能。不过在最后这一个月时间内,选情仍然可能出现变化。

最大的变数仍然是疫情。从以往经验来看,疫情形势好转有助于提升联盟党支持率。但目前德国疫情出现反弹,如若默克尔领导的政府不能采取有效对策,联盟党支持率恐进一步受拖累。

其次是各党竞选政策。临近选举,选民对各党竞选政策的关注可能会增加,进而影响其投票意向。另外,目前尚无出现负面新闻的肖尔茨能否“一白到底”还有待观察。

美国多州去年1月出现新冠死亡病例

据新华社旧金山8月24日电 美国《圣何塞信使新闻》网站近日发表的一篇独家报道称,美国多州首例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死亡病例发生在2020年1月,比此前官方报告的首例新冠死亡病例提前了数周。专家据此推测,新冠疫情可能早在2019年12月甚至11月就已在美国多地出现。

《圣何塞信使新闻》22日刊登的一篇题为“美国首例新冠死亡病例比之前认为的更早——且发生在各地”的报道说,加利福尼亚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堪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和威斯康星州各有一份去年1月的死亡证明被“悄悄”修改,即把感染新冠病毒列为死因之一。威斯康星州卫生服务部目前已在其数据中列出2020年1月22日一名50至59岁的女性可能死于新冠。

上述报道援引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荣誉教授、传染病专家约翰·斯沃茨伯格的话说,美国早期的新冠病例可能被当作感冒或流感。

他认为,最新的新冠死亡数据表明,新冠病毒有可能早在2019年12月甚至11月就出现在美国,因为从感染新冠病毒到死亡通常要3周。



2021年第一季度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事件数量整体增长169%,其中纽约市增长率高达223%,旧金山增长145%,洛杉矶市增长80%,波士顿市增长60%。

美国政客毫无顾忌地发表造成种族歧视的错误言论,让族裔团结和对抗系统性种族主义的目标更加遥不可及。

“我们是谁?”

即使疫情平息,美国的族裔矛盾也难以烟消云散。美国的人口结构正逐步发生重大变化,对“美国人”的身份认同能否超越族裔界限将成为巨大挑战。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针对2020年全美人口的统计,非拉美裔白人目前占全美人口的58%,低于此前预计的60%,而且这些人在美国3100个郡县的400个中已不再是多数族裔。这一趋势让非拉美裔白人焦虑不安,而这种焦躁情绪也是2016年推动特朗普当选总统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无论是谁执政,似乎也难以回答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向美国人提出的问题:我们是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关乎美国族裔平等的未来和应对内部冲突的前景,还关乎美国的国家特性、国家利益以及美国将以怎样的方式与世界交往。

(作者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管窥天下



修复文物

埃及对位于南部城市卢克索的卡纳克神庙等众多文物古迹开展修复保护工作。图为8月25日,工作人员在卡纳克神庙建筑群进行修复工作。新华社发(艾哈迈德·戈马摄)

美国族裔矛盾的痼疾何以难消

阅读提示

族裔矛盾几乎贯穿了美国历史,成为美国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系统性弊病。新冠疫情的冲击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加剧了族裔之间的不平等和歧视,也让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面临巨大挑战。

20世纪初,移民群体的文化背景是盎格鲁-撒克逊,因此针对其他移民更注重新文化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用公式概括就是“A+B+C+……=A”,意味着要成为“美国人”必须坚持盎格鲁-撒克逊的主流文化。

第二阶段是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一战影响,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美国,“熔炉”说逐渐出现,用公式概括就是“A+B+C+……=E”,意味着美国人的文化背景不再局限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而是试图兼容并蓄,融合不同移民所代表的文化。

第三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美国人发现,族裔在一定程度融合的同时,原先进族的差异性却顽固地保持了下来,“熔炉”成了“沙拉拼盘”,用公式概括就是“A+B+C+……=EA+EB+EC+……”,意味着身份认同成了保留各个族裔部分原有文化传统的“美国人”。

族裔问题几乎贯穿了整个美国历史,也是不断探寻“美国人”自身认同的过程。无论是北美殖民者对土著印第安人的屠杀、白人针对黑人奴隶的压迫,还是此后禁止华人成为美国公民的《排华法案》,无不体现美国族裔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是美国作为移民国家付出的代价,也是美国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根源性和系统性弊病。

错误政策加剧歧视

当下,美国的族裔矛盾并不消停。无论是特朗普任内的夏洛茨维尔骚乱,还是拜登任内针对亚裔的仇恨案件,都证明美国社会

仍被不同族裔之间的对立所困扰。

“病毒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原本指的是任何人面对新冠病毒都是脆弱的,但美国不同族裔之间却出现了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并非因为各个族裔有不同的生理特点,而是由于不同族裔的生存条件差异以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族裔分化最终成为面对疫情时高低有别的脆弱。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截至2021年7月16日的统计,美国非洲裔和拉美裔与白人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不成比例,非洲裔的比例是白人的两倍,拉美裔的比例是白人的2.3倍。疫苗接种方面,虽然自身拒绝接种的非洲裔和白人占其族裔总人数的比例差不多,但非洲裔的实际接种率却远低于白人。

新冠疫情以一种极度悲凉的方式将美国的系统性种族歧视暴露在世人面前,其中包括了贫富差距、警察有针对性的暴力执法和医疗体系的不平等。

美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将传染病归咎于特定族裔,比如一些人曾将霍乱称为“爱尔兰病”,将肺结核的传播归咎于犹太人等,还有更多人并不清楚“西班牙大流感”实际上并非源于西班牙。

而这一次,新冠疫情推升了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倾向,美国政府并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针对新冠病毒溯源的政治化操弄直接加剧了针对亚裔的歧视甚至犯罪。

根据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的研究,相比2020年第一季度,美国15个大城市

美国种族问题透视 ①

孙成昊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有关亚裔在美国遭受仇恨犯罪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章,让人不禁问道:美国的族裔矛盾为何难以消除?

二战之后,族裔问题(尤其是非洲裔遭歧视)一度成为美国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在那个年代,既涌现了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和平斗士,希望通过唤醒更多民众的意识来争取平等权益;也出现了以马尔科姆·艾克斯为代表的激进人士,试图“以暴力对暴力”,掀起了美国一段波澜壮阔的平权抗争。

时至今日,虽然非洲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在美国的处境相较过去有所改善,但种族歧视作为一个历史性、系统性和结构性顽疾却并未根除。

即使美国总统拜登在挑选内阁成员时强调族裔多元,这种在精英阶层有意识的平权举动也无法掩盖社会层面的族裔冲突。在新冠疫情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冲击下,一些族裔矛盾被挑去了遮羞布,再次浮出水面。

国家发展的系统性弊病

美国一直被称作“移民国家”,移民赋予其独特的属性。一方面,大量移民为美国带来了人力资源、先进技术,不同国家的移民也碰撞出了丰富多元的文化与艺术。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历史时期来到这片大陆的移民主体不同,这部移民史同时也是族裔同化与冲突史。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戈登1964年出版了《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一书,将美国族裔关系发展大致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英国向北美移民开始直至